
確定安世高的譯經集：及其相關研究綜述*

左冠明 (Stefano Zacchetti) 著
紀寶 譯

1. 引言

安息譯師安世高約於後漢時期的公元2世紀中葉活躍於洛陽，他可以被認為是中國佛教最早的歷史人物。他是將佛經譯成漢語活動的先驅，這些譯經活動持續了近千年之久，他可能也就成為了中國前現代時期文化間交往的最重要代表。因此非常自然，安世高個人以及他的譯著早就吸引了東西方漢學家與佛教學家們的注意力。

由於眾多原因（諸如中古漢語研究的興盛、新近中亞發現的印度語佛教寫本等），在過去10-15年間，發表了大量關於這位中國佛教史中的關鍵人物（比如Forte 1995）及其譯著的研究。

在本文之中，我將討論所有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歸到安世高名下的現存經本，並為每部經本提供了若干基礎的信息，諸如現存的印度語與漢語平行本，以及或多或少討論過這部特定經本的書籍與

* 此文通篇之中的巴利語本我都引用了第六次聖典結集 (Chattā Saṅgāyana) 的 CD-ROM 第3版，但都參考了巴利聖典學會的諸版本。此文的結構我依照何離巽 (Harrison 1993)，並且更為直接地參照了1997:267-278。我非常榮幸地向這位學者表示致謝，他對安世高譯經的研究無論是在靈感還是在資料方面都讓我受益匪淺。我還要感謝哈特曼教授 (Jens-Uwe Hartmann)，他好心地給我寄來了他的未發表的“特許任教資格論文” (Habilitationsschrift, 1992)。譯者注：本文原文為“Defining An Shigao's 安世高 Translation Corpu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Relevant Research”，發表於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2010年，第3輯，頁249-270，北京：科學出版社。

文章。¹確實，本文的一個寫作目標就是提供一個，雖然很是粗略的安世高研究的綜述。²但是，我此文的主要關注還是在目前藏經之內的那麼多歸到安世高名下經本的真偽這一棘手問題。

我非常清楚此文依然還有未竟之處，其中有很多缺陷，並且其所提供的信息也只是暫時的（特別是關於安世高譯經的印度與漢語平行本部份）。

2. 納入許理和的安世高譯經清單中的經典

就我所知，許理和是第一位挑戰這一問題之人，即要建立一個安世高的譯經目錄³，其根據包括外在的（早期經錄與經序的證據）與內在的（語言、風格、術語）標準。誠然，甚至在許理和兩篇令人難忘的文章（Zürcher 1977與1991）之前，也還有對此問題的若干討論，⁴但是它們大多數都只不過是僅以經錄研究以及其他外在證

¹ 最近，那體慧刊行了一部重要的關於早期漢語譯經的著作（Nattier 2008），其中除了其他，還包含有對安世高譯經的詳細而又深具啟發的討論（前引，頁38-72，譯者：漢譯本由紀實譯出，收於《漢語佛教文獻研究》，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頁165-220）。不幸的是，此文完成之後那體慧的書才出版，因此我就不能對之充分利用。

² 在此應該提到有兩項正在進行的對安世高譯經的研究。首先，我引用那體慧的話（Nattier 2008: 72）：“有一個重大的國際合作項目正處在計劃階段，這個項目想要系統地研究所有東漢時期的非大乘經典（其中大多數要歸到安世高的名下），此項目由辛嶋靜志與方一新二人協調開展”。第二是維德（Tilman Vetter）教授對安世高譯經編制辭典的項目（《安世高辭典》）。這部著作目前正在收錄超過1600個漢字（2007年9月20日個人通信），並且在很多地方還引用了安世高譯經的印度語平行本。這部辭典之中所收納的經本都見於許理和的清單（見下面2-3部份），並增加了T.1557與金剛寺寫經（參下面4-5部份），以及《大方等大集經》之中的《十方菩薩品》T.397，頁394b 8以後（參Deleau 1993: 43 n. 99與Nattier 2008: 55-59）。

³ 事實上許理和（Zürcher 1977、1991）討論了整個後漢譯經，而非僅只是安世高的譯經。

⁴ 見比如，大谷勝真，1924；Forte 1968；以及巨贊的一篇文章，《安世高所譯經的研究》（最初發表於1959年的《現代佛學》；現收於巨贊，2000，卷1: 144-153）。宇井伯壽關於安世高的著述（宇井伯壽，1971: 1-467），可以說是脫穎而出，成為了到當時為止所發表的唯一一部對安世高譯經的全面研究。對所有他認為確實是安世高所譯的經典，他都提供了日本語譯本（用訓譯的方式），這樣他的著作之中就有大量詳細的文本研究。但是，這部著作卻是在宇井伯壽去世之後才出版，是根據了宇井的筆記（見中村元的後記，頁551-552），所以還是一部草稿本。

據為基礎。而許理和，卻第一個開始系統地描述了後漢譯經的語言，並清楚地表明了檢視最早期的經錄（特別是僧祐的《出三藏記集》T.2145），還總是需要輔以對經本自身的語言學與風格特點分析。⁵

作為他對後漢譯經研究的成果，許理和在他1991年文章中（頁297-300）⁶，附錄了一個他認為是現存漢代譯經的目錄。這個目錄（此後我將把關於安世高譯經的部份簡稱為“許理和目錄”）幾乎就是又一個20世紀末的著名的道安錄（許理和確實是以道安錄為基礎），它對此後早期漢語佛教文獻的研究深具影響。說的沒錯，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因為許理和的慧眼明察，這才讓早期譯經的研究走上了正軌。

但是，現在讓我們回到安世高的翻譯之中。在此前的部份我順便提到了目前對這一主題突然湧現出來的不少研究。因此，我們比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對於安世高譯經的總體，就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圖景。更不用提意外出現在日本的一個寫卷（見下面第5部份）。這也就使得許理和的目錄，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在若干細節上加以修訂。我的分析將以在我看來，是安世高譯經目錄之中不太需要修訂的部份（誠然，也是一些篇幅比較大的部份）開始，並以它們在《大正藏》之中所出現的次序來排列。

i.《長阿含十報法經》T.13

德雍（de Jong）以更早的赤沼智善的研究為基礎，認為這是一部對保存在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中的《十上經》（*Daśottarasūtra*）的翻譯（de Jong 1968: 4-5 與 20-21）。就總體而言，安世高的翻譯與

⁵ 見Zürcher 1977: 177 與特別是1991: 278-279，其中許理和討論了建立後漢譯經目錄所採用的標準。

⁶ Zürcher 1977 pp. 202-203之中作為附錄B，還有這個目錄的一個更早的版本。

米塔爾 (Mittal) 及謝林洛甫 (Schlingloff) 所整理的梵語本殘片相當吻合。由於這部佛經其名數架構組織得非常機智，並且也非常便於使用（也就是說，除了其他之外，也是一個佛教關鍵術語的名副其實、方便實用的專業詞典），《長阿含十報法經》一般而言就可以很容易地與存世的梵語平行本作一番比較，因此它也就成為了不僅是研究安世高譯經，還是研究整個早期漢語譯經的最為有用的資料之一。

印度語平行本：德國吐魯番搜集品中收入了不少說一切有部《十上經》的殘片，這在上面已經提到過了；這些殘片分別被米塔爾 (Mittal 1957)、謝林洛甫 (Schlingloff 1962) 所編輯，並且也為此經提供了一個方便的重構本。在中亞寫本的搜集品之中還有其他一些此經的梵語殘片。⁷對應的巴利藏經之中佛經為《十上經》(*Dasuttarasuttanta*, 《長部》，卷III, 頁272-292)。

其他漢譯本：收在漢譯《長阿含經》之中的《十上經》，T.1, 頁52c 18-57b 24。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 1971: 245-270 (再加上注釋, 見於頁 271-275)。

研究：de Jong 1966; 辛嶋靜志在他對《十上經》的翻譯之中, 在註釋裡面常常會討論安世高的《長阿含十報法經》及其與其他版本之間的關係。

⁷ 見哈特曼與維勒, 1992: 28 (照片146, 殘片87) 以及其他各處 (見索引中關於此經的部份, 頁59) ; 以及維勒 (Klaus Wille) 的研究, 收於辛嶋靜志與維勒, 2006: 58 (索引) ; 對於若干殘片的編輯, 見75、80、110及其他各處。

ii.《人本欲生經》T.14

這是《大因緣經》(**Mahānidānasūtra*)的一個版本，基本詮釋的是緣起支。在此我并不想處理棘手的部派歸屬問題。但是，可以發現就總體而言，安世高的譯本與收在漢譯《中阿含經》之中的《大因經》(T.26, 經號第97)更為接近，後者一般認為是屬於說一切有部，⁸安世高的譯本則離巴利對應本更遠一點。不過，就我所知，對所有這些版本作系統比較的工作還尚待開展。

《人本欲生經》是安世高譯經之中少數有早期註釋本的佛經之一，這部注釋就是道安的《人本欲生經注》(《大正藏》中如此題名) T.1693, 道安還寫了一篇經序，其中就將此經暫時歸到了安世高的名下。⁹此註釋連同佛經自身一起由宇井伯壽譯成了日語(見下面的參考資料)。

印度語平行本：現存印度語平行本主要是巴利本《長部尼柯耶》之中的《大因緣經》(*Mahānidānasutta*, 《長部》，卷II, 頁 54-71)；來自中亞的梵語殘片中也有若干被確定為是《大因緣經》(*Mahānidānasūtra*)。¹⁰

其他漢譯本：依照赤沼智善(1929: 160), 漢語大藏經之中包含有下列《人本欲生經》的平行本：《大緣方便經》，此經屬於《長阿含經》中的第13號經(T.1, 頁60a 28-62b 27)；《大因經》(漢語《中阿含經》中的第97號經, T.26, 頁578b 7-582b 5)；《大生義經》T.52, 這是後來施護(北宋時期)所翻譯。

⁸ 榎本文雄, 1986: 21-22.

⁹ “斯經似安世高譯為晉言也。”(《出三藏記集》, T.2145, 頁45a 26-27)。

¹⁰ 見斯密特豪森Schmithausen 2000: 48 n. 28 (亦參Vetter 1994: 139 n. 12)。亦見Hartmann and Wille 1992: 30 (照片150, 殘片259) 與頁44 (照片184, 殘片45)。這個梵語本可能是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中阿含經》(亦見Harrison 1997: 84 n. 65)。

現代翻譯：字井伯壽1971: 36-113；此經的開始一小部份被譯成了英語，譯者為許理和（作為Vetter 1994: 159-160中的附錄）。

研究：Vetter 1994; Schmithausen 2000。

iii. 《一切流攝守因經》T.31¹¹

此經處理了七種可以被窮盡的諸流（āśrava）（流盡）：1. 流從見斷（對應於巴利平行本中的：..... āsavā dassanā pahātabbā, “..... 通過見來斷流”；2. 流從守斷（..... āsavā saṃvarā pahātabbā）；3. 流從避斷（..... āsavā parivajjanā pahātabbā）；¹²4. 流從用斷（..... āsavā paṭisevanā pahātabbā）；5. 流從忍斷（..... āsavā adbhivāsana pahātabbā）；6. 流從曉斷（..... āsavā vinodanā pahātabbā）；¹³7. 流從增行斷（..... āsavā bhāvanā pahātabbā）。

印度語平行本：《一切漏經》（*Sabbāsavaṣutta*，《中部》，第2號經，卷I，頁6-12）。¹⁴

其他漢譯本：《漏盡經》（《中阿含經》，第10號經，T.26，頁431c 13-432c 28）；《增壹阿含經》第40.6號經（T.125，頁740a 25-741b 16）。

¹¹ 在此處（以及大多數安世高所翻譯的其他經典也是如此），本人討論的基礎信息是由Harrison 1997: 277-279所提供了，特別是印度語及漢語的平行本。何離異還討論了安世高所翻譯的此經以及其他佛經在各部大本阿含經之中的歸屬問題，見其1997年文章的附錄（見頁284）。

¹² 《一切流攝守因經》中的第3、4、5項，分別對應於巴利語本之中的5、3、4項。

¹³ 用“曉”（一般意思是：“明亮；理解等等”，見《漢語大詞典》，上海，1986-1994，卷5，頁832b）字來翻譯“vinodana”是有問題的，而在大藏經的南方系統之中所發現的異文“曉”字也沒有什麼幫助（關於這個“曉”字，亦見字井伯壽，1971: 332）。不過，這兩個術語之間的對應關係是毋庸置疑的。還可能有一個平行本，見《十上經》（*Daśottarasūtra*）IX.7.7 (vinodayati, 收於Schlingloff 1962: 22) 並參考T.13，頁240a 2，但是在此例之中，其梵語本非常零碎，並且與安世高的翻譯有點距離（亦參de Jong 1966: 23-24，對Nīpāta IX.7的註釋）。

¹⁴ 梵語與藏語的平行本，見Harrison 1997: 278。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 327-331 (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31-334)。

研究：Harrison 1997: 278。

iv. 《四諦經》T.32

“這是一部在舍利曰 (Śāriputra)、目犍連 (Maudgalyāyana) 被佛陀稱讚之後，前者向諸比丘說四聖諦的佛經” (Harrison 1997: 277)。在此經的末尾，還附有一個來自《大安般守意》T.602——可能是一個早期註釋的遺存——的簡短註釋引文（不過，並非是在所有的早期藏經版本之中都有）。¹⁵

印度語平行本：《諦分別經》(*Saccavibhaṅgasutta*, 《中阿含經》第141號經，卷III，頁248-252)。

其他漢譯本：《分別聖諦經》，（《中阿含經》，第31號經，T.26，頁467a 28-469c 8）；《增一阿含經》，第27.1號經（T.125，頁643a 26-c 1，由無著比丘，2006翻譯）。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 306-314 (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15-317)。

研究：Harrison 1997: 277。

v. 《本相猗致經》T.36

這是一部短經，介紹了兩組因果系列，一組是負面的，一組是正面的，每組共有十項。前者以“有愛”（巴利平行本之中的**bhavataṇhā**）為開始，後者以“度世智慧解脫”（參巴利平行本之中的**vijjāvimutti**）

¹⁵ 見宇井伯壽，1971: 316; Deleanu 2003: 86-87 with n. 54。

為開始。¹⁶這兩組各十種的清單中的每一項，從第二項開始，都被當成是前一項的“本”（對應的巴利語為āhāra，“食物，支撐”）¹⁷。

印度語平行本：《食經》（*Āhārasutta*¹⁸）（《增支部》，卷V，頁116-119）。

其他漢譯本：《本際經》；《食經》（《中阿含經》，第51-53經，T.26，頁487b 3-489c 27）之中的第一經與第二經；《緣本致經》T.37。¹⁹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318-320（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20-321）。

研究：Harrison 1997：278。

¹⁶ 就總體而言，《本相猗致經》與《增支部》之中的平行本對應得非常好；但是，正如何離異（Harrison 1997：278）之中所評論的，此經缺乏在巴利本以及T.26、T.52與T.53之中的關於大海及“匯入”大海的江河的比喻。除此之外，在這些不同版本之中，在兩個系列的因果要素之中還有若干差異。《本相猗致經》與巴利本這二者都有兩組十項。但是，巴利本中的第6-7項，也就是asatāsampajañña與ayonisomanasikāra，其對應的安世高所譯，只有“非本念”（這可能是對應於前者）。另一方面，在《本相猗致經》系列的結尾，有兩項，即“非賢者人事”與“非賢者人共會樂”，而巴利語本則只有asappurisasamsevo（這可能是對應於安世高清單中的最後一項）。而在正面的諸項之中，我們在做了必要的修改之後，也發現有同樣的情況。T.37是一部相當獨特的失譯經，它似乎有著T.36同樣的清單，雖然這二者之間由於詞彙上一些奇怪的差異、篇幅拉長以及非同尋常的翻譯風格，從而掩蓋了二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但是事實上，在T.36之中所發現的一些奇怪譯法也可以在T.37之中找到，這表明T.37的編輯校訂者曾經參考過安世高的這部更早的譯經。在《中阿含經》之中，有三部小經（見宇井伯壽，1971：321）可以被認為是《本相猗致經》的平行本，每部小經中的清單都由11項構成。其中第一個清單中的第6-7項，分別為“不正念”、“不正智”與“不正思惟”，而第10-11項，則是“親近惡知識”與“惡人”。

¹⁷ 注意T.26中的第52-53號經之中，都與巴利本完全一樣，將這些清單之中的表示原因的因素稱為“食”，而T.26第51經（《本際經》）則用了“習”字，而這個術語則很可能就是samudaya（比如，見Zacchetti 2002：77 n. 25）。這可能也意味著，在《本相猗致經》T.36（以及在T.37）之中的“本”或者“致本”的意思也是如此。因為《本際經》T.26.51之中也沒有大海的比喻（見前注），就很可能是此經，而非是關於“食”的佛經，才是《本相猗致經》最為接近的平行本。

¹⁸ 第六次聖典結集的CD-ROM第3版之中，此經的經題作“*Taṇhāsutta*”（《貪愛經》）。

¹⁹ 這是一部失譯經（但確實是一部相當奇怪的佛經：參上面注16），依照《大正藏》之中的副標題，則被歸到了東漢時期（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此經的經題在《出三藏記集》之中找不到，不過，僧祐曾經記載過“《緣本經》，一卷”（《出三藏記集》，T.2145，頁35a 28）。

vi.《是法非法經》T.48

此經描述了若干“非賢者法”（參巴利平行本之中的“asappurisdhamma”）的典型錯誤行為——也就是可能導致一個人傲慢並且鄙視其僧人同儕的那些品質或成就——並且解釋了一位“賢者”（sappuriso）在每一個例子之中應如何考慮。

印度語平行本：《善人經》（*Sappurisasutta*，《中部》第113經，卷III，頁37-45）。

其他漢譯本：《真人經》（《中阿含經》，第85經，T.26，頁561a 20-562a 17）。²⁰

現代翻譯：字井伯壽，1971：322-325（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25-326）；范·馬爾森van Malssen 2007：44-53。

研究：van Malssen 2007：36-38。

vii.《漏分布經》T.57

“六種精神上有害的要素（諸漏（āśrava）、痛、思想、愛慾、行與苦），以及如何去理解并消除它們”（Harrison, 1997：277）。

印度語平行本：《抉擇經》（*Nibbedhikasutta*，《增支部》，卷III，頁410-417）。²¹

²⁰ 早期中國的目錄學家們，早就指出了T.48與《中阿含經》之中的佛經有平行關係：比如，見《開元釋教錄》，T.2154，頁479c5（《是法非法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二十一卷。異譯見土行、僧祐二錄；注意在《出三藏記集》之中并無此一信息）。

²¹ 何離異（1997：277-278，關於一個藏譯本見注49）指出過，在《俱舍論》（*Abhidharmakośa*）曾引有此經一個平行本的梵語段落（IV.1b，見沙斯特里編輯，卷2，頁447：sūtra uktam: “dve karmaṇi cetanā karma cetayitvā ca”）。在《漏分布經》之中的平行段落應該是下面一段（確實不是特別清楚）：何等為當知行？謂所思念向不離是為行。如是為知行。（T.57，頁853a 24-25）；參T.26，頁600a 23-24，此處與梵語本引用的部份非常吻合：云何知業？謂有二業：思、已思業。是謂知業。（CBETA, T.01，第26號經，頁600，a23-24）。

其他漢譯本：《達梵行》（《中阿含經》，第111號經，T.26，頁599b 8-600b 26）。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296-303（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03-305）。

研究：Harrison 1997：277-278。

viii.《普法義經》T.98

正如哈特曼 (Jens-Uwe Hartmann) 所指出(1989: 41-43; 1992: 288-289)，此經乃是譯自《廣義法門經》(*Arthavistarasūtra*)，這是一部就我們所知，只是流傳於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之中的經典。此經主要是有一個以數字組織起來的範疇清單，這就與《十上經》頗為類似（參上面的§ 2.i部份——並且此二者都屬於《長阿含經》中的同一品），雖然其組織安排要更為簡單一點。

印度語平行本：有一個重新構擬的梵語本《廣義法門經》，並且與藏譯本作對勘，見Hartmann 1992: 319-336（相關註釋見頁342-365）；亦見Hartmann 1989: 44-46。

其他漢譯本：真諦的《廣義法門經》T. 97。²²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276-285（再加上注釋，見於頁285-295）。

研究：Hartmann 1989, 1992（見上）and 1996；山部能宜，1997：162-169。

²² 依照在《大正藏》之中經本結束 (T.97, 頁922a26) 的出經記，則當系年於公元563年。

ix.《八正道經》T.112

此經闡述了八邪道與八正道，這也就是更廣為人知的“八聖道”。八邪道只是列出，而八正道中的每一道都有很詳細的處理。

印度語平行本：依照赤沼智善(1929: 236)，則《八正道經》應該是對應於《相應部尼柯耶》之中的《邪性經》(*Micchattasutta*，卷V，頁17-18)，不過此經卻只有兩列範疇的清單。

其他漢譯本：赤沼智善良(出處同前)指出《雜阿含經》的第784號經(T.99，頁203a 1-18)是T.112的平行本。這兩部經之間的關係當然要比與上面提到的巴利語經本之間的關係要密切。²³不過，安世高的翻譯本要差得多：T.112中的最後一部份(頁505a 23-b 12)在《雜阿含經》平行本中找不到。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 340-341(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41-343)。

研究：—

x.《七處三觀經》T.150A

這是一部屬於《增一阿含經》中的44部小經組成的經集，²⁴其所提出的諸多複雜問題(特別是關於文本流傳與組織的問題)，何離巽作出了典範性的研究(1997)。除了重新構建這部在傳抄過程中殘缺錯亂嚴重的佛經的原始次序之外，何離巽還為這個經集之中每一部小經提供了詳細的信息(主要內容、印度語與漢語平行本等)。

²³ 正如《大正藏》之中校勘記所言，正是收在《雜阿含經》T.99之中的第770號經，頁201a 9-24(而非第784號經)才與巴利本《邪性經》最為對應。

²⁴ T.150A實際上被確定為就是《出三藏記集》，頁6a 13之中所列出的安世高所譯經典之中的《雜經四十四篇》(見Harrison 1997: 265-266)。

同一作者還發現，在T150A開頭的兩部經，即《七處三觀經》（《大正藏》將整個經集就命名為此經）與《九橫經》，以及一部在末尾所發現的小經，即《積骨經》，事實上并非是這部《增一阿含經》的經集之中原本所有，而可能是屬於一部《雜阿含經》。所有這三部小經，在藏經之中都在T150A之外傳播。《七處三觀經》與《積骨經》也可以在一部《雜阿含經》的單本經T.101（見§4）之中找到，而《九橫經》在T150B之中則是一部單獨的經典。為了方便計，我在目前這一段之中將它們都當成是T150A中的一部份。

印度語與漢語平行本：見Harrison 1997: 267-276。²⁵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 353-370（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70-376）。維德與何離異（Vetter and Harrison 1998）則發表了一個《七處三觀經》（**Saptasthānasūtra*）的巴利——漢語概要本以及英語翻譯。何離異還英譯了第12號經（依照何離異的編號：見1997: 269），收在迪亞茲 Dietz 2002: 30-31之中。²⁶馬伯樂（Maspero 1967: 193）曾將《九橫經》的一小部份（開頭與結尾）譯成了法語。

研究：Harrison 1997；山部能宜，1997: 169-176（關於《九橫經》）；陳明，2003（關於第12號經）。

xi.《陰持入經》T.603

這是一部奇怪的論著，它部份是依照古代傳統摩得勒伽來加以組織（正如T.603的題名所顯示，是以諸蘊、界與入來開始），其中主要包含有幾個關鍵佛教概念的清單。

²⁵ 對第26號經，最近剛剛發現一個犍陀羅語本：見Allon 2001: 248（亦見頁259與284）。而對第12號經的一個梵語平行本，見下注。

²⁶ 迪亞茲研究的第一部份，介紹了若干新近發現的《盲經》（**Andhasūtra*）的梵語殘片，這對部經對應於安世高所譯單本經的第12號經。

《陰持入經》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即除了提供很多佛教教義與修行的基本概念的定義之外（經常是超過一個定義），此論還經常顯示是如何將它們聯繫到一個具有意義的次序之中。由於這個原因，假如《十上經》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佛教術語的方便的辭典，那麼《陰持入經》當然就是一部具有更為複雜特性的經本。由於它有非常接近的印度語平行本（詳情見後），《陰持入經》就對研究安世高的語言與術語特別有幫助。

此經還有一個很古老的註釋存世：這就是收入《大正藏》之中的《陰持入經注》（這不是其原始題名）T.1694。這部註釋可能要追溯到公元3世紀的前半葉，²⁷它可能是研究早期中國佛教思想現存最為重要的資料。

印度語平行本：《藏釋》第六品“經義集地”（Suttatthasamuccayabhūmi），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不幸的是，保存得非常糟糕），保存在巴利語之中的早期藏外經典；見巴魯阿（Arabinda Barua）編輯的《藏釋》，巴利聖典學會，（經典系列第88種），倫敦1949（1982年修訂本），頁112-138, 14。²⁸注意《陰持入經》與“經義集地”二者都不完整；但是前者要比後者篇幅短，整個漢譯的部份都包括在巴利對應本之中。

其他漢譯本：—

現代翻譯：字井伯壽，1971：114-183，包括安世高的《陰持入經》以及對它的注T.1694（再加上注釋，見於頁183-200）。

研究：山部能宜，1997：157-162；Zacchetti 2002與2007；任繼愈，1981：230-296；蔡振豐，1999（特別是關於註釋）。

²⁷ 對《陰持入經注》T.1694可能的年代與撰者，見Zacchetti forthcoming。

²⁸ 還應該提到髻智比丘的重要翻譯：《藏釋》（翻譯系列第35），巴利聖典學會，倫敦，1964。與《陰持入經》對應的部份，見頁155-185 (§ 560)。

xii.《道地經》T.607

這是對僧伽羅刹 (Saṅgharakṣa) 的《修行道地經》(Yogācārabhūmi) 的節譯。《道地經》只包括了非常可能就是僧伽羅刹所撰原本之中27品中的7品。²⁹

一般而言, 安世高的譯經都相當枯燥無味, 《道地經》則有著非比尋常的特點, 它既詞藻豐富又形象生動。假如就是因為這些特點, 那麼這就是安世高譯經之中最為有意思的譯著之一, 其中有大量少見的語詞 (甚至還有少見的漢字)³⁰, 這就使得《道地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安世高譯經團隊所譯出的最為艱深的一部經典, 而這個譯經團隊所譯出的就素以艱深而聞名。

印度語平行本: -

其他漢譯本: 竺法護於公元3世紀末所譯的《修行道地經》T606。³¹

現代翻譯: 宇井伯壽, 1971: 411-431(再加上注釋, 見於頁431-436)。

研究: Demiéville 1954(關於安世高的翻譯, 特別見頁343-347); Deleanu 1997。

xiii.《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T.1508

在大多數古代大藏經版本之中, 此經都被歸到了另外兩位後漢譯師, 也就是安玄與嚴佛調的名下。但是, 這卻是一個在公元6世紀末時所產生的錯誤, 基於外在以及內在的證據, 《阿含口解》都可以被安全地歸到安世高及其譯經圈子的名下。³²

²⁹ 見Deleanu 1997: 38與n. 41 p. 48。

³⁰ 惠琳的《一切經音義》之中就收錄了特別多的《道地經》中的詞條, 這就體現了安世高所譯的這一版《瑜伽師地論》之中的詞語解釋問題: 見T. 2128, 頁791b 18-792c 7。

³¹ 關於這部第二譯, 見Demiéville 1954: 347-350。

³² Zacchetti 2004: 212-219。

至少在大藏經中流通的那些歸到安世高名下的諸經典之中（對一部沒有收進大藏經的經典，參下面 § 5.iv），這一部其實並不算是一部譯著，而非常可能，正如其題名所顯示，是一部某種“口頭的解釋”（口解），由安世高向其弟子們宣說。雖然主要是闡述緣起法，但《阿含口解》觸及了眾多或多或少有所相關的其他主題，諸如人體的生理機能、出生的過程。³³

印度語平行本：—³⁴

現代翻譯：—

研究：Zacchetti 2004。

3. 應該重新考慮的那些許理和目錄中的安世高名下譯經

在許理和的安世高譯經目錄之中，由於種種原因，我認為有3部經典（到目前為止一般被認為是真經）不應該被視為安世高的譯著。當然勿庸贅言，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完全有可能將這種情況再次改變。

i. 《大安般守意經》T.602

本節之中所討論的其他兩部經典（T.605與T.792）都是非常短的譯著，沒有多少特別的重大意義，而《大安般守意經》T.602則被公認為是安世高所翻譯的最重要的經典之一，並且當然它也是很久以前就被廣泛研究的一部佛經。³⁵至於其性質，到目前為止的共識就是，

³³ 見Zacchetti 2004: 198-207，其中有一個《阿含口解》的概要介紹。

³⁴ 但是，我在對此經的研究之中(2004: 207-212)曾經指出過，《阿含口解》中的一部分顯示了與《稻芊經》(*Śālistambasūtra*)有若干驚人的相似之處，而此經我們有6個譯本(1個藏語本，5個漢語本)，以及在梵語資料之中眾多的引用。《阿含口解》的結尾部分(T.1508, 頁55a 26-b 1; 見Zacchetti 2004: 207)則在巴利藏經之中有一個平行本，也就是第一部《阿那律經》(*Anuruddhasutta*, 《增支部》，第127經，卷I, 頁281); 亦參《增壹阿含經》T.125, 頁608c 3-23。

³⁵ 對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經》（這個題目現在應該用來指金剛寺本——見下面§ 5.i——而非指T.602）的早期接受，見林克Link 1976。

T.602是一部安世高的譯經，其傳本，我借用許理和的話（1991: 297）就是“已經與一部注釋混在了一起，兩者之間已然密不可分”。

新發現的金剛寺本寫經，其中就包括另一部名叫《安般守意經》的經典，這是一部古老的翻譯，完全可能就是安世高所譯，並且其中也沒有注釋（見下面§ 5.i），這就容許我們可以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T.602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Zacchetti 2007b）所主張的，現在有大量的證據表明：（a）這并非是一部翻譯再加上混入其中的注釋，而只是對一部另外的經典（即金剛寺本《安般守意經》）所作的注釋；³⁶（b）雖然其中包含了很多可能反映了安世高思想的資料，但T.602卻并不是一部由安世高直接撰寫的作品。³⁷

印度語平行本：－

其他漢譯本：參下面§ 5.i 部分。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1: 201-235³⁸（再加上注釋，見於頁235-244）；杜繼文，1997（譯為現代漢語）。

研究：對《大安般守意經》T.602有著大量的研究文獻，在此限於篇幅，只列數種參考：荒牧典俊，1971: Deleanu 1992, 1992b, 1993與2003; 任繼愈，1981:296-314; 落合俊典，2002; 洪鴻榮，2006; Zacchetti 2004c與2007b。

³⁶ 見Zacchetti 2007b（不久將作為文章發表），此文詳細地討論了所有那些支持《大安般守意經》T.602只是一部注釋的證據。

³⁷ 事實上，T.602顯示了若干安世高譯經之中沒有的語言學特點，比如使用了（雖然不算常見）名詞性從屬結構的虛詞“之”字（參§ 3.ii-3.iii）。有點諷刺的是，《大安般守意經》T.602經常被認為是最為可靠的安世高譯經之一（見Demiéville 1954: 343 n. 3與353 n. 1; Zürcher 1991: 279）。

³⁸ 宇井伯壽在他的翻譯之中，想要把他認為的，安世高所翻譯的原經與所謂的混入的行間註分開來。假如正如我在我的關於《大安般守意經》T.602的文章（2007b）中所想要證明的，它只不過是一部注釋，那麼宇井伯壽在這個例子之中，其整個計劃就是錯的。

ii. 《禪行法想經》T.605

《禪行法想經》T.605是一部短經，它闡釋了一系列的“想”（saṃjñā）的對象，其中大多數都見於廣為人知的十想以及各種“不淨想”（aśubhasaṃjñā）的清單之中，³⁹不過這部譯經之中有若干條目還有待確認。特別是最後幾項，在不淨想之後（從“世間無所歸想”開始，T.605，頁181c 1-4）。

傳統上將《禪行法想經》T.605歸到安世高的名下，這早在僧祐的目錄（《出三藏記集》，T.2145，頁6b 2）之中就已有記載，這看起來證據非常確鑿。但是，正如林屋友次郎（1941:794-795）所指出的，《禪行法想經》T.605與《大正藏》中緊排在它前面的《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特別地類似。⁴⁰特別是，我們發現T.604內容之中菩提分的每一組，其介紹的模式都與T.605之中的（若彈指間，惟行……是為精進行禪，為如佛教，不是愚癡食人施。何況多行者；參下面注42-43）完全一樣。順便提一句，還要注意這兩部佛經的題名中都存有“禪行”這個同樣的元素。

《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在大藏經之中也被歸到了安世高的名下，但是僧祐的安世高譯經清單之中卻沒有它。它被收於了道安的“新集安公失譯經錄”（收於《出三藏記集》，T.2145，頁16c 21）之中，這表明，至少此經肯定是一部相當古老的翻譯。《禪行三十七品經》第一次被歸到安世高的名下，是在費長房臭名昭著的歷代三寶紀（T.2034，頁50c 10）之中。而智昇權威的《開元釋教錄》（T.2154，頁718c 11-12）則認可了這一說法，這可能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現在的大

³⁹ 對這些概念的信息，見Lamotte 1970: 1311-1313與1431-1432。

⁴⁰ 宇井伯壽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兩部經之間的相似性。參他對T.604的討論（1971: 444, no. 17），在此他基於內在證據而完全認為此經不可能為安世高所為。

藏經之中會把它歸到安世高名下了。至少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又是一次經典地證明了，費長房的目錄所體現出來的不太理智的熱情，並對這個領域之中造成了扭曲性的影響。

在費長房關於《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的詞條之中，他提到了“寶唱錄”，但是他將之歸到安世高的名下，可能也基於此經與T.605之間的類似性。確實，幾乎可以肯定，這兩部佛經（其背景都是在舍衛國）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並且參考到它們的巴利語平行本（見下面注43），還可能推測它們是一起翻譯的，是一對佛經。

現在對T.604的進行內在的分析，就顯示它可能并非是安世高所譯。除了在風格與詞彙上與安世高的其他漢譯經典有差異之外，我們還在這部翻譯之中發現了足以將《法受塵經》T.792（見下面§3.iii）也剔除出安世高所譯經典之外的特點中的一種。在《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之中，從屬助詞“之”字共出現了四次（比如“得四喜之事”，頁181 a12；“不貪之德”，頁181b 2），這種情況在安世高譯經之中極其罕見（見Zacchetti 2007: 403）。正如人們所能意料，在《禪行法想經》T.605之中也有此一特點，不過在那裡並不是那麼明顯，因為此經甚短。⁴¹但有一件事似乎是非常明確的：這兩部經乃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假如我們要將T.604從安世高譯經之中剔除（我認為確實應該如此），那麼也應該將T.605同樣剔除出去（亦見Nattier 2008: 53-55；參林屋友次郎，1941: 795-796及其以後）。

印度語平行本：正如何離異所主張（Harrison 1997: 277），最為接近的巴利語平行本是在《增支部尼柯耶》之《禪定品》（Jhānavagga）之中的一節（卷I，頁41-42）。在此我們發現有一系列的“想”（sañña），與T.605之中有部分對應，並且還伴隨著有一個重複的段落，它也存

⁴¹ 在《禪行法想經》之中，這種用法出現過一次：“念此諸想之事”（T.605，頁181c4-5）。這個翻譯中與其他一些安世高譯經不符的特點，在Nattier 2008: 54之中有詳細討論。

於安世高翻譯的開頭與結尾（稍有變動）。⁴²但是就整個結構而言，並且已經評論過了，T.605內容的很大一部分都與巴利本有著顯著的差異。⁴³

其他漢譯本：－（但是參考上面對T.604的討論，它明顯與T.605）。

現代翻譯：宇井伯壽，197: 346（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47-348）；
van Malssen 2007: 63-65。

研究：Harrison 1977: 277; van Malssen 2007: 58-60。

iii. 《法受塵經》T.792

這部短經，是對應於《增支部尼柯耶》的第1經（卷I，頁1-2），對其信息，見Harrison 1997: 277。

《法受塵經》存於僧祐的安世高譯經目錄之中（《出三藏記集》，T.2145，頁6a 22）。認為此經可疑，這只是基於內在的證據。⁴⁴除了相對頻繁地出現從屬助詞“之”字（比如在“無上吉祥之道”，或“好色之女”之中；參§ 3.ii與上面的注37），以及出現了第一人稱代詞“吾”（而安世高一直使用“我”）之外，我們還可能會注意到在此經之中，有

⁴² 比如：Accharāsaṅghātamattam pi ce, bhikkhave, bhikkhu maraṇasaññaṃ bhāveti; ayaṃ vuccati, bhikkhave-‘bhikkhu arittajjhāno viharati satthusāsanakaro ovādapatikaro, amoghaṃ raṭṭhapīṇaṃ bhuñjati’. Ko pana vādo ye naṃ bahulīkaronti!（《增支部》，卷I，頁41）。參《禪行法想經》：若以彈指間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為精進行禪，為如佛教，不是愚癡食國人施也。何況多行者！（T. 605，頁181b 22-24）。

⁴³ 考慮到與T.605的聯繫，那很明顯就可以找到《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的一個巴利平行本（有著上面提到過的T.605的所有特性），也就是同樣在《增支部尼柯耶》中《禪定品》之中的另外一節，更為準確地說是《增支部》卷I，頁39-40，在此處菩提分法也運用了同樣的模式（accharāsaṅghātamattam pi ce ecc）。

⁴⁴ 有段時間之前，那體慧教授與我分別注意到了傳統上將此經歸到安世高名下是存有問題的（現在見Nattier 2008: 53-55）。後來，我在2007年7月在北京時，知道胡敕瑞教授在一篇文章（見胡敕瑞，2005: 272 § 2.2以及相關註釋）之中曾經討論過此問題，並且討論得相當詳細（論據也更多）。

時會使用四言詩體，而這在安世高的其他譯著之中是完全陌生的。

⁴⁵簡而言之，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可以重新考量傳統對《法受塵經》的歸名。⁴⁶

現代翻譯：字井伯壽，1971: 344（再加上注釋，見於頁345）。

研究：Harrison 1997: 277；胡敕瑞，2005: 272。

4. 許理和目錄之外暫定為安世高譯經的經典

在最近一篇文章之中，何離異（Harrison 2002）主張有充分理由將一部失譯的《雜阿含經》經集，也即《雜阿含經》T.101的至少一大部份都歸到安世高的名下（參Nattier 2008: 67-68）。

這可能并不是唯一從大藏經之中加進安世高譯經目錄之中的。衆所周知，在後漢滅亡之後的數百年中，特別是在《出三藏記集》編纂之後，有大量的譯經被歸到了這位聲譽卓著的漢語佛教譯經大師的名下。依照許理和（Zürcher 1991: 278）“在繼起的諸目錄之中，歸到安世高名下的經典從34部增加到了179部”。⁴⁷總而言之，我們不能不贊同許理和的嚴格標準，即完全不承認“公元4世紀之後的歸名”，這樣方能為漢代譯經的研究奠定一個良好基礎，並且毫無疑問，在目前大藏經之中被歸為安世高譯經的經典就只有極少數可以被考慮確

⁴⁵ 見比如下一段：“凡人為法，受塵自污，迷惑憂愁，沒而無際。”（T.792，頁37a 9-10）。

⁴⁶ 不過，由於主要一點就是，我們對於安世高譯經工作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我就完全同意胡敕瑞的明智審慎態度，就是假如我們考慮到了翻譯過程的複雜性（比如受“筆受”的影響等等），那對此問題要得出一個結論可能就沒有那麼簡單了（胡敕瑞，2005: 272，注6；參林屋友次郎，1941: 796，關於T.605）。

⁴⁷ 對於錯誤歸到安世高名下譯著的詳細研究，見字井伯壽，1971: 437-453。

實為安世高所譯。不過，我認為我們現在擁有的研究工具，⁴⁸足以使我們來重新考察這些被認為不是安世高譯經的大量經典，而少一點過去一刀切的作派。

《阿毘曇五法行經》T.1557是對**Pañcavastuka*的翻譯，這是一部說一切有部的阿毘曇論書，它相當於*Prakaraṇapāda*（《眾事分阿毘曇論》T.1541；《阿毘達磨品類足論》T.1542）的第一品（*Pañcavastuka*, T.1541, 頁627a 8-628c 27; T.1542, 頁692b 22-694b 2）。⁴⁹這部經典，傳統被歸到了安世高的名下，但許理和并不承認，而我看來應對此重新考慮。

德國吐魯番搜集品之中就有若干這部獨立的**Pañcavastuka*及其相關註疏**Pañcavastukavibhāṣā*（今西順吉，1969）的殘片；在大藏經之中還保存有對本經及其註釋的分別兩部漢譯本（《五事毘婆沙論》T.1555；《薩婆多宗五事論》T.1556）。⁵⁰所有這些文獻最為引人注目的教義方面，就是它們介紹了有名的“五法（譯者：即有名的“五位七十五法”中的“五位”），這構成了後來說一切有部對一切法分類的基礎”（Cox 1998: 215）。在《阿毘曇五法行經》之中，這五個範疇就被譯為了“色”（*rūpa*）、“意”（*citta*）、“所念”（*caitta*）、“別離意行”（*cittaviprayukta*）與“無為”（*asaṃskṛta*）。⁵¹

⁴⁸ 比如，受惠於CBETA搜索引擎，現在我們可以以僅僅數年前還無法想像的方式來研究早期譯經的詞彙。假如我可以用這個形象的話，我甚至可能用失譯經來“釣魚”，而魚餌就是一個非比尋常的術語或者是語言學用法。

⁴⁹ 戴密微（1958: 421-422）描述T.1557與T.1556是“兩部對*Prakaraṇapāda*的*pañca-vastu*的獨立翻譯”（*deux traductions indépendantes du chapitre du Prakaraṇapāda consacré aux pañca-vastu*）。不過，正如考克斯（Collette Cox）所言，至少T.1557有著一個非常不同的結構（見下面注51）。

⁵⁰ 這條信息我引自考克斯，1998: 213-214（以及注222）；關於這些翻譯，亦見林藜光 Lin 1949: 48 n. 2。

⁵¹ T.1557, 頁998c 9-11。正如考克斯所評論（Cox 1998: 215-216），在T.1557之中，這種基本的分類並沒有出現在一開始，而其他可以比較的經典則是如此（包括T.1556：見頁995c 7-8）。

至於說到這部經為誰所譯，我們在此例之中所面對的情況則異於何離異所討論的《雜阿含經》T.101。事實上，在僧祐的目錄之中它早就被歸到了安世高的名下（《出三藏記集》，T.2145，頁6a 2），⁵²並且，初看起來，其語言學與風格特點也似乎並沒有與一部後漢時期的譯經，或者甚至與安世高的譯經有明顯不符之處。⁵³

當然，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T.1557就一定要歸到安世高的名下。很簡單，因為許理和沒有將之收入其安世高譯經目錄之中的原因完全并不清楚。因此，就有必要仔細地重新審視這部譯著，以便能確定是否有特定的論據來改變將之歸到安世高名下的傳統記錄。

5. 最近重新發現的安世高譯經

1999年，梶浦晉先生頗為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又發現了不少新的安世高譯經。這些經典出自大阪縣的金剛寺，此寺中有著大量寫經，而其中有兩個寫經卷子中收藏有若干不為人知的經本，這些經本與漢代的譯師活動似乎有關係。⁵⁴這兩個寫經卷（寫卷甲本與寫卷乙本），除了少數異文外內容相同。落合俊典在2004年（頁183-227）發表了寫卷甲本的轉寫（包括寫卷乙本的異文校勘記）。在此後的討論之中，我會稱這個轉寫為“寫卷”。

金剛寺寫經之中除了康僧會著名的《安般守意經序》（寫卷行1-60）之外，這個序在《大正藏》之中分別存於兩處（T.602，頁163a

⁵² 此一譯著在經錄之中的記載，見Forte 1968: 171-177。

⁵³ 戴密微對傳統將《阿毘曇五法行經》歸到安世高名下，似乎證實了“其漢語風格非常古老”（Demiéville 1953: 446 § 2134；亦參1958: 422）。宇井伯壽也認為T.1557也認為這是一部真經，並且是與現存安世高譯經之中的其他經典一同譯出（1971: 380-390），並對他的譯本作了一個相當詳細的注釋（頁390-410）。

⁵⁴ 見梶浦晉，2001。

6-c 8; 《出三藏記集》, T.2145, 頁43a 1-c 3), 其他剩下來的經典, 在最近被發現之前, 都基本上不為人所知(除了在古老的目錄之中偶有提到并有一些引用之外)。這些很清楚都是古老的佛經, 並且基於內在與外在的證據, 它們是安世高及其譯經團隊的產物的可能性也很高。我在下面列出這些經典, 並且一如往常, 還列出若干基本信息。

i. 《安般守意經》(行61-275)

在上面 (§ 3.i) 已經提到過了, 這部佛經是關於根本性的安般念 (ānāpānasamṛti) 禪定的修行, 它與收在大藏經之中被歸到安世高名下的同名佛經 (《大安般守意經》T.602) 完全不同 (不過并非沒有聯繫)。

在翻譯之後, 附錄了一個很短卻非常有意思的注疏, 這個注疏其形式為共有三個解釋, 每個解釋之前都有“師云”的字樣 (行276-282)。⁵⁵

印度語平行本: -

其他漢譯本: - (關於T.602, 參§ 3.i)。

現代翻譯: -

研究: Deleanu 2003; 落合俊典, 2002; Zacchetti 2002b。

ii. 《佛說十二門經》(行283-365)

此經介紹了三重禪定修行的系列 (經題中所指的“十二門”) : 四“自觀” (smṛtyupasthāna, 譯者: 即念處)、四無量 (慈maitrī等等)、以及四無色定。在第一部分(行284-343)之中, 詳細描述了這些階段, 接著是更短的第二部分 (行344-365), 此部分之中討論了與每個階段

⁵⁵ 見Deleanu 2003: 70-71 with n. 20; Zacchetti 2003: 287-289。

有聯繫（或無關）的因素或特點。這一部分在處理最初四門時，呈現了若干有意思的教義發展，其中將四念處與四種禪定階段作了匹配，其方法是通過每一個階段需要捐棄的一些因素。在此處我們發現其對“念”（vitarka）/待（vicāra）這一對概念的處理非比尋常。⁵⁶

印度語平行本：－

其他漢譯本：參《佛說解十二門經》（見下面第iii號）。

現代翻譯：Zacchetti 2004b。

研究：Zacchetti 2003與2005。

iii. 《佛說解十二門經》（行366-385）

在對金剛寺本寫經的初步研究之中，人們以為寫卷中剩下的所有文本都屬於這部《佛說解十二門經》。不過，這部經的末尾（行384-385）有著通常常見的佛經流通分（佛說如是，弟子歡喜受行），這就標出了它的結尾。這個“十二門經”的第二部分，其結構與內容都與前面一部經，即《佛說十二門經》（參前面小節的討論）的第二部分非常相似。

印度語平行本：－

其他漢譯本：參《佛說十二門經》（上面第ii部分）。

現代翻譯：－

研究：Zacchetti 2003（特別是頁259-261）。

iv. 匿名的“十二門”注（行386-584）

⁵⁶ 見Zacchetti 2003: 270-277與2005。

緊接著《佛說解十二門經》之後，就是另外一部經典（如其他寫卷之中的經典一樣為匿名所為，並且也沒有題名），并一直到整個寫卷的最後。基於其內容與形式，這部經典被定為是一部對“十二門”（行386-455）以及其他禪定相關主題的注疏。除了其他東西，他也包括對於禪定的一個詳細而又重要的討論（行455以後）。對此一注疏的研究表明這是一部古老的經典，可能是在安世高的譯經圈子之中所撰成，它記錄了安世高對於“十二門”經本的口頭講解（參上面§ 2.xiii）。

印度語平行本：－

其他漢譯本：－

現代翻譯：－

研究：Zacchetti 2003 (pp. 278-296)與2004c。

參考文獻與縮略

Abhidharmakośa: Swami Dwarikadas Shastri (ed.), *Abhidharmakośa & Bhāṣya of Ācārya Vasubandhu with Sphuṭārthā Commentary of Ācārya Yaśomitra*, 2 vols, Bauddha Bharati, Varanasi 1998 (1970)

《俱舍論》：沙斯特里（編輯），《〈俱舍論〉與世親阿闍梨的注釋及稱友阿闍梨的明義注》，2卷本，包達布拉第，瓦納那西1998（1970）。

Akanuma, Chizen 赤沼智善 1929, *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Āgamas & Pāli Nikāyas* 漢巴四部阿含互照錄, Hajinkaku-shobō, Nagoya

赤沼智善, 1929, 《漢巴四部阿含互照錄》，破塵閣書房，名古屋。

Allon, Mark (with a contribution by Andrew Glass) 2001, *Three Gāndhārī Ekottarikāgama-Type Sūtras-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2 and 1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 Volume 2), Seattle and London

艾倫，馬克（安德魯·格拉斯亦有貢獻）2001，《三種犍陀羅語本〈增一阿含經〉類型的佛經：大英圖書館犍文殘片12與14》，華盛頓大學出版社，西雅圖與倫敦。

Anālayo 2006, “The *Ekottarika-āgama* Parallel to the *Saccavibhaṅga-sutta* and the Four (Noble) Truth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3(2), 2006, pp. 145–53

無著比丘, 2006, 《〈諦分別經〉與四（聖）諦的〈增一阿含經〉平行本》，收於《佛教研究評論》23(2), 2006, 頁145–53。

Aramaki, Noritoshi 荒牧典俊 1971, “Indo Bukkyō kara Chūgoku Bukkyō he: Anpan shu i kyō to Kō Sōe, Dōan, Sha Fu jo nado” インド仏教から中国仏教へ—安般守意經と康僧會・道安・謝敷序など, *Bukkyō shigaku* 仏教私学 vol. 15 no. 2 (1971), pp. 121-165

荒牧典俊, 1971, 《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安般守意經〉與康僧會、道安、謝敷的序》，收於《佛教史學》，卷15.2(1971), 頁121-165。

蔡振豐, 1999, 《〈陰持入經注序〉中格義問題的考察》, 收於《中國文學研究》, 卷13, 1999, 頁1-38。

陳明, 2003, 《新出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平行梵本殘卷跋》, 收於《西域研究》, 卷4, 2003, 頁59-65。

Cox, Collett 1998, “Kaśmīra: Vaibhāṣika Orthodoxy”, in Charles Willemen, Bart Dessein and Collett Cox, *Sarvāstivā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 Brill, Leiden-New York-Köln 1998, pp. 138-254

考克斯, 1998, 《迦濕彌羅：正統毗婆沙師》, 收於魏查理、德森與考克斯, 《說一切有部佛教經院哲學》, 博睿, 倫敦-紐約-科隆, 1998, 頁碼38-254。

《出三藏記集》：僧祐, 《出三藏記集》T.2145。

Deleanu, Florin 1992, “An Seikō yaku *Anpan shui kyō genkō-bon no seiritsu ni tsuite*” 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現行本の成立について, in: *Tōyō no shisō to shūkyō* 東洋の思想と宗教, 9 (1992), pp. 48-63

迪拉魯, 1992, 《關於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現行本的成立》, 收於《東洋的思想與宗教》9 (1992), 頁48-63。

Deleanu, Florin 1992b,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in the *Dhyāna Sūtras*”,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n. XXXVII, 1992,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ōhō Gakkai), pp. 42-57

迪拉魯, 1992b, 《〈禪經〉之中的安般念》, 收於《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 第XXXVII號, 1992, 東方學會, 頁42-57。

Deleanu, Florin 1993, “An Shigao 安世高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nban shouyi jing* 安般守意經 (Part one)”, in: *Ronsō: Ajia no bunka to shisō* 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 n. 2 (1993), pp. 1-47

迪拉魯, 1993, 《安世高與〈安般守意經〉的歷史》(第1部分), 收於：《亞洲文化與思想論叢》, 卷2 (1993), 頁1-47。

Deleanu, Florin 199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An Shigao’s 安世高 Translation of the *Yogācārabhūmi* 道地經”, in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Kansai Medical University*, vol 17, 1997, pp. 33-52

迪拉魯, 1997, 《安世高所譯〈道地經〉的初步研究》, 收於《關西医科大学教養部紀要》, 關西医科大学, 卷17, 1997, 頁33-52。

Deleanu, Florin 2003, “The Newly Found Text of the An ban shou yi jing Translated by An Shigao”,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 vol. 6, March 2003, pp. 63-100

迪拉魯, 2003, 《新發現的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研究紀要》第6號, 2003年3月, 頁170-133 (號碼反行)。

Demiéville, Paul 1953, “Le bouddhisme-Les sources chinoises”, in Louis Renou and Jean Filliozat (eds.), *L’Inde classique-Manuel des études indienne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Paris 1953 (repr. 2000), pp. 398-463

戴密微, 1953, 《佛教漢學資料》, 收於勒努與費遼扎 (編輯), 《印度經典: 印度研究手冊》, 法國遠東學院, 巴黎, 1953 (2000年重印), 頁398-463。

Demiéville, Paul 1954, “La *Yogācārabhūmi* de Saṅgharakṣ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XLIV.2 (1954), pp. 339-436

戴密微, 1954, 《僧伽羅叉的〈道地經〉》, 收於《法國遠東學院院訊》, XLIV.2 (1954), 頁339-436。

Demiéville, Paul 1958, review of Yamada Ryūjō, “Abidaruma goi no sōchō” and “Pāri-kei bukyō ni dōshite daijōwa sodatanakatta ka”, *T’oung Pao* vol. 46, 1958, pp. 420-426

戴密微, 1958, 《對山田龍城的〈阿毗達磨提出的五事〉與〈巴利佛教為何沒有發展出大乘佛教〉二文的書評》, 收於《通報》, 卷46, 1958, 頁420-426。

Dietz, Siglinde 2002, “Fragments of the *Andhasūtra, of the Sūtra on the Three Moral Defects of Devadatta, and of the Kavikumrāvadāna”, in Jens Braarvig (General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II-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2, Hermes Publishing, Oslo, 2002

迪亞茲, 2002, 《〈*盲經〉、〈提婆達多三過犯經〉與〈詩人童子譬喻經〉》, 收於顏子伯 (主編), 《斯柯延搜集品寫經》III: 佛教寫經卷 2, 荷爾墨斯出版社, 奧斯陸, 2002。

杜繼文 1997 (翻譯), 《安般守意經》,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第116號,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

Enomoto, Fumio 1986,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Chinese Āgama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1, 1986, pp. 19-30

榎本文雄, 1986, 《關於漢語阿含經原始經本的形成》, 收於《佛教研究評論》, 卷3, 號1 (1986), 頁19-30。

Forte A. 1968, “An Shih-kao: biografia e note critiche”, *Annali dell'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28 (1968), pp. 151-194

富安敦, 1968, 《安世高: 傳記與評注》, 收於《那不勒斯東方研究所年鑑》, 28 (1968), 頁151-194。

Forte, Antonino 1995,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6, Kyoto

富安敦, 1995, 《質子安世高及其後裔: 中國的一個伊朗家族》, 京都: 意大利文化處, 東方學研究所。

Harrison, Paul 1993,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hāyāna Buddhist Sūtras: some notes on the works of Lokakṣema”,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10, 2, pp. 135-177

何離異, 1993, 《最早的漢語大乘佛經翻譯: 雜談支婁迦讖的譯經》, 收於《佛教研究評論》, 卷10, 2, 頁135-177。

Harrison, Paul 1997, “The *Ekottarikāgama* Translations of An Shigao”, in: Petra Kieffer-Pülz and Jens-Uwe Hartmann (eds.), *Bauddhavidyāsudhākaraḥ: 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Indica et Tibetica, 30), Swisttal-Odendorf 1997, pp. 261-284

何離異, 1997, 《安世高所翻譯的〈增一阿含經〉》, 收於基弗-普爾茲與哈特曼(編輯), 《貝歇特六十五歲生日紀念集》, (印度學西藏學, 30), 斯威斯塔爾-奧登多夫, 1997, 頁261-284。

Harrison, Paul 2002, “Another Addition to An Shigao’s Corpus? Preliminary Notes on an Early Chinese *Samyuktāgama* Translation”, in: *Early Buddhism and Abhidharma Thought-In Honour of Doctor Hajime Sakurab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seventh Birthday* 初期仏教からアビダルマへ (櫻部建博士喜壽記念論集), Heirakuji Shoten, Kyoto, pp. 1-32

何離異, 2002, 《又一部安世高的譯經? 一部早期漢語〈雜阿含經〉譯本的初步研究》, 收於《櫻部建博士喜壽記念論集》, 2002京都: 平樂寺書店, 頁1-32。

Hartmann, Jens-Uwe 1989, “Fragmente aus dem *Di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s*”, *Sanskrit-Texte aus den buddhistischer Kanon: Neuentdeckungen und Neuedition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89, pp. 37-67

哈特曼, 1989, 《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殘片》, 收於《佛教藏經之中的梵語經典: 新發現與新校定》, 范登霍克與魯本里希, 哥廷根, 1989, 頁37-67。

Hartmann, Jens-Uwe 1992, *Untersuchungen zum Dirghāgama der Sarvāstivādins*, Unpublished Habilitation Thesis, Göttingen

哈特曼, 1992, 《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研究》, 未發表的特許任教資格論文, 哥廷根。

Hartmann, Jens-Uwe 1996, “An Shigao’s Translation of the Arthavistarasūtra (T 98)”,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The Works of An Shigao”, Leiden, 19 December 1996

哈特曼, 1996, 《安世高翻譯的〈佛說普法義經〉(Arthavistarasūtra (T.98))》, 未發表的論文, 呈交於“安世高作品”國際工作坊, 萊頓, 1996年12月19日。

Hartmann, Jens-Uwe and Wille, Klaus 1992, “Die nordturkistan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Sammlung Hoernle (Funde Buddhistischer Sanskrit-Handschriften, II)”, *Sanskrit-Texte aus den buddhistischen Kanon: Neuentdeckungen und Neueditionen II*,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92, pp. 9-63

哈特曼與維勒, 1992, 《霍恩勒搜集品之中的新疆北部梵語寫本》(佛教梵語寫本集成, II), 收於《佛教藏經之中的梵語經典: 新發現與新校定》, 范登霍克與魯本里希, 哥廷根, 1992, 頁9-63。

Hayashiya, Tomojirō 林屋友次郎 1941, *Kyōroku kenkyū* 經錄研究, vol. 1, Iwanami shoten, Tokyo

林屋友次郎, 1941, 《經錄研究》, 卷1, 岩波書店, 東京。

胡敕瑞, 2005, 《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 收於《漢語史學報》, 第5期, 2005, 頁270-279。

Hung, Hung-lung 2006, “The Newly Found Kongō-ji Manuscript An-Ban Shou-Yi Jing and T 602 Fo-Shuo Da An-Ban Shou-Yi Jing-An Analysis of T 602 to Distinguish the Original Scripture from its Commentary”,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印度學仏教学研究, vol. 54, 3 (2006), pp. 1226-1231

洪鴻榮, 2006, 《新發現的金剛寺本〈安般守意經〉與T.602〈大安般守意經〉: 對T.602的分析以區分出其原始經本與註釋》, 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卷54, 3 (2006), 頁1226-1231。

Imanishi, Junkichi 1969, *Das Pañcavastukam und die Pañcavastukavibhāṣā (Abhidharmatexte in Sanskrit aus den Turfanfunden I)*,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I.,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今西順吉, 1969, 《〈五事論〉與〈五事毘婆沙論〉》(吐魯番搜集品中的阿毘達磨典籍 I), 哥廷根科學院通訊 I, 文獻學-歷史學類, 范登霍克與魯本里希, 哥廷根。

de Jong, J. W. 1966, “The Daśottarasūtra”, *Kanakura Hakushi Koki Kinen: Indogaku Bukkyōgaku Ronshū*, Kyoto, 1966, pp. 3-25 (reprinted in G. Schopen, ed., *Buddhist Studies by J.W. de Jong*, Berkeley, 1979, pp. 251-273)

德雍, 1966, 《十上經》, 收於《金倉博士古稀記念印度學仏教學論集》, 1966, 3-25 (重印收於紹本編輯, 《德雍佛教研究論集》, 伯克利, 1979, 頁 251-273)。

巨贊, 2000, 《巨贊文集》, 2卷本,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

Kajiura, Susumu 梶浦晋 2001, “Kongōji issaikyō to shinshutsu An Seikō yaku butten” 金剛寺一切經と新出安世高訳仏典, *Bukkyōgaku semina* 佛教学セミナー n. 73, May 2001, pp. 25-44

梶浦晋, 2001, 《金剛寺一切經與新出安世高譯佛典》, 收於《佛教學紀要》, 號73, 2001年5月, 頁25-44。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2000 (tr.), “Jūjōkyō” 十上經, in: *Gendaigo yaku ‘Agon kyōten’-Jōagongyō* 現代語訳「阿含經典」——長阿含經, vol. 3, Hirakawa Shuppansha, Tokyo, 2000, pp. 37-74 (translation) and 157-215 (notes)

辛嶋静志, 2000 (翻譯), 《十上經》, 收於《現代譯語阿含經典: 〈長阿含經〉》, 卷3, 平河出版社, 東京, 2000, 頁37-74 (翻譯) 與頁157-215 (注釋)。

Karashima, Seishi and Wille, Klaus 2006 (eds.),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 vol. I,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Soka University, Tokyo

辛嶋靜志與維勒, 2006 (編輯), 《中亞的佛教寫本: 大英圖書館梵語殘片, 卷1》, 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創價大學, 東京。

Lamotte, Étienne 1970,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 Tome III, Louvain

拉莫特, 1970, 《大智度論》, 卷3, 魯汶。

Lin, Li-kouang 1949, *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Recherches sur un Sūtra Développé du Petit Véhicule*, Maisonneuve, Paris

林藜光, 1949, 《小乘經〈正法念處經〉研究》, 麥松納沃, 巴黎。

Link, Arthur E. 1976, "Evidence for Doctrinal Continuity of Han Buddhism from the Second through the Fourth Centuries. The Prefaces of An Shih-kao's *Grand Sūtra on Mindfulness of the Respiration* and K'ang Seng-hui's Introduction to the 'Perfection of Dhyāna' ", in: James B. Parsons (ed.),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Woodbridge Bingham. A Festschrift for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San Francisco, 1976, pp. 55-126

林克, 1976, 《從公元二世紀到四世紀漢傳佛教教義統一性的證據, 安世高〈大安般守意經序〉與康僧會對“禪定波羅密”的介紹》, 收於帕森斯 (編輯), 《賓漢姆教授七十五歲紀念集》, 舊金山: 中國資料中心, 1976, 頁 55-126。

van Malssen, Hubertus M. G. 2007, *Three Early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on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hi fa fei fa jing T 48, the Chan xing fa xiang T 605, and the Chan xing sanshiqi pin jing T 604*, Unpublished M.A. Thesis, Ca'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academic year 2006-2007

范·馬爾森, 2007, 《三部早期漢語佛教禪修經典:〈是法非法經〉T.48、〈禪行法想經〉T.605與〈禪行三十七品經〉T.604譯注》, 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學, 2006-2007學年。

Maspero, Henri 1967,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II Le Taoïs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馬伯樂, 1967, 《宗教與中國史遺集之二: 道教研究》, 巴黎: 法國大學出版社。

Mittal, Kusum 1957, *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 Fragmente des Daśottarasūtra aus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IV), Akademie-Verlag, Berlin

米塔爾, 1957, 《古代佛教的教義術語系列之一: 中亞梵語寫本的〈十上經〉殘片》(吐魯番梵語文獻, IV), 柏林: 學術出版社。

Nattier, Jan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Soka University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 Tokyo

那體慧, 2008, 《最早漢語佛教譯經指南: 東漢、三國時期的經典》, 創價大學高等佛教研究所 (佛教目錄學、文獻學與哲學系列之十), 東京。

Ochiai, Toshinori 落合俊典 2002, “*Dai anban kyō to Shō anban kyō*”『大安般經』と『小安般經』,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印度學仏教学研究, vol. 51, 1 (2002), pp. 31-36

落合俊典, 2002, 《〈大安般經〉與〈小安般經〉》, 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卷51, 1 (2002), 頁31-36。

Ochiai, Toshinori 落合俊典 2004 (ed.), *Kongōji issayikyō no kisoteki kenkyū to shinshutsu butten no kenkyū* 金剛寺一切經の基礎的研究と新出仏典の研究, Research Report, Tokyo

落合俊典, 2004 (編輯), 《金剛寺一切經的基礎研究與新出佛典的研究》, 研究報告, 東京。

Ōtani, Shōshin 大谷勝真 1924, “An Seikō no yakkyō ni tsuite” 安世高的譯經に就いて, *Tōyō gakuho* 東洋學報, vol. 13, no. 4, 1924, pp. 102-139

大谷勝真, 1924, 《關於安世高的譯經》, 收於《東洋學報》, 卷13, 號4, 1924, 頁102-139。

任續愈 (編輯) 1981, 《中国佛教史》, 卷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988年重印)。

Schlingloff, Dieter 1962, *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a. Daśottarasūtra IX-X*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IVa), Akademie-Verlag, Berlin

謝林洛夫, 1962, 《古代佛教的教義術語系列之一A: 〈十上經〉IX-X》 (吐魯番梵語文獻, IVa), 柏林: 學術出版社。

Schmithausen, Lambert 2000, “Zur zwölfgliedrigen Formel des Entstehens in Abhängigkeit”, *Hōrin* no. 7, 2000, pp. 41-76

斯密特豪森, 2000, 《緣起的兩層結構》, 收於《法輪》, 卷7, 2000, 頁41-76。

Ui, Hakuju 宇井伯壽 1971, *Yakkyōshi kenkyū* 訳經史研究, Iwanami Shoten, Tokyo

宇井伯壽, 1971, 《譯經史研究》, 岩波書店, 東京。

Vetter, Tilmann 1994, “Zwei schwierige Stellen im Mahānidānasutta”,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Band XXXVIII, 1994, pp 137-160

維德, 1994, 《〈大因緣經〉的兩個難點》, 收於《維也納南亞研究》, 卷 XXXVIII, 1994, 頁137-160。

Vetter Tilmann, Harrison Paul 1998, “An Shigao’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aptasthānasūtra*”, in: Paul Harrison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Sūryacandrāya-Essays in Honour of Akira Yuyam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Indica et Tibetica, 35), Swisttal-Odendorf 1998, pp. 197-216

維德與何離異, 1998, 《安世高的漢譯〈七處三觀經〉》, 收於何離異與紹本(編輯), 《日月: 湯山明六十五歲紀念集》(印藏學, 35), 斯威斯塔爾-奧登多夫, 1998, 頁197-216。

Yamabe, Nobuyoshi 山部能宜 1997, “An Shigao as a Precursor of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in: *Watanabe Takao kyōju kanreki kinen ronshū: Bukkyō shisō bunkashi ronsō* 渡邊隆生教授還曆記念仏教思想文化史論叢 (Buddhist Thought and History of Buddhist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tanabe Takao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Nagata Bunshōdō, Kyoto 1997, pp. 153-194

山部能宜, 1997, 《作為瑜伽行傳統先驅的安世高: 初步研究》, 收於《渡邊隆生教授還曆記念佛教思想文化論叢》, 京都: 永田文昌堂, 頁153-94。

Zacchetti, Stefano 2002, “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pter 6 of the *Peṭakopadesa*-An Shigao’s *Yin chi ru jing* T 603 and its Indian Original: A Preliminary Surv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5 (1), 2002, pp. 74-98

左冠明, 2002, 《〈藏釋〉第六章的一個早期漢譯對應本: 安世高的〈陰持入經〉T603及其印度起源的初步研究》, 收於《亞非學院院訊》, 號 65 (1), 2002, 頁74-98。

Zacchetti, Stefano 2002b, “Brief Communicat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Kongōji Manuscript of An Shigao’s *Anban Shouyi jing* 安般守意經”,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1*, n. 5, 2002, pp. 157-158

左冠明, 2002b, 《簡訊：關於金剛寺本安世高〈安般守意經〉的真偽》，收於《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2001, 5, 2002, 頁157-158。

Zacchetti, Stefano 2003, “The Rediscovery of Three Early Buddhist Scriptures on Medit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Fo shuo shi’er men jing*, the *Fo shuo jie shi’er men jing* Translated by An Shigao and Their Commentary Preserved in the Newly Found Kongō-ji Manuscript”,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2*, n. 6, 2003, pp. 251-299

左冠明, 2003, 《三部早期禪定佛教經典的重新發現：新發現金剛寺安世高譯〈佛說十二門經〉、〈佛說解十二門經〉以及注釋的初步研究》，《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2002學術年，卷6, 2003, 頁251-299。

Zacchetti, Stefano 2004, “Teaching Buddhism in Han China: A Study of the *Ahan koujie shi’er yinyuan jing* T 1508 Attributed to An Shigao”,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3*, n. 7, 2004, pp. 197-224

左冠明, 2004, 《在中國的漢代傳授佛教：歸名為安世高的〈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T.1508研究》，《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2003學術年，卷7, 2004年，頁197-224。

Zacchetti, Stefano 2004b, “The Scripture on the Twelve Gates Preached by the Buddha”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Fo shuo shi’er men jing*, Kongō-ji Ms A, ll. 283-365), in Ochiai 2004: 231-240

左冠明, 2004b, 《佛說十二門》（金剛寺寫經甲本（行283-365）《佛說十二門經》譯注），收於落合俊典, 2004: 231-240。

Zacchetti, Stefano 2004c, “An Shigao’s Texts Preserved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Kongō-ji Manuscript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m”,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vol. 52, 2 (2004), pp. 57-60

左冠明, 2004c, 《新發現寫本之中所保存的安世高經典及其對早期漢傳佛教研究的重要性》, 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卷52.2, 頁251-299。

Zacchetti, Stefano 2005, “Brief Communication: 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Terms 念 and 待 in the Kongō-ji Manuscript Text of An Shigao’s *Shi’er men jing* 十二門經”,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4* n. 8, 2005, pp. 395-396

左冠明, 2005, 《簡論關於金剛寺寫經中安世高〈十二門經〉中的“念”與“待”》, 收於《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 2004學術年, 卷8, 頁395-396。

Zacchetti, Stefano 2007, “Inventing a New Idiom: Some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Yin chi ru jing* 陰持入經 T 603 Translated by An Shigao”,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6* n. 10, 2007, pp. 395-416

左冠明, 2007, 《發明新語言范式：安世高譯〈陰持入經〉T.603的若干方面》, 《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 2006學術年, 卷10, 2007年, 頁395-416。

Zacchetti, Stefano 2007b, “Translation or commentary? On the Nature of the *Da anban shouyi jing* (大安般守意經) T 602”,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 of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ienna, April 18-21, 2007

左冠明, 2007b, 《翻譯還是註釋？關於〈大安般守意經〉的性質》, 未發表會議論文, 提交到“早期漢語佛教譯經研討會”(奧地利科學院亞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 維也納, 2007年4月18-21日舉行。

Zacchetti, Stefano (2010), “Some remarks on the Authorship and Chronology of the *Yin chi ru jing zhu* T 1694: The Second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t Exegetical Literature”, in Giacomella Orofino and Silvio Vita (eds.), *Buddhist Asia 2. Papers from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Buddhist Studies Held in Naples in June 2004*, (Università di Napoli “L’Orientale”. Centro di Studi sul Buddhismo),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左冠明, 2010, 《〈陰持入經注〉T.1694的作者與系年散論：漢語佛教註釋文獻發展的第二階段》，收於奧羅菲諾與維塔（編輯），《亞洲佛教2：2004年6月在那不勒斯舉行的第二屆佛教研討會會議論文》（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頁141-198，意大利國立東方學研究所，京都。

Zürcher, Erik 1977, “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XIII-3-oct. 1977, pp. 177-203

許理和, 1977, 《最早的佛教翻譯之中的後漢方言因素》，收於《漢語教師學會會訊》，XIII, 1977, 頁177-203。

Zürcher, Erik 1991,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r of Prof. Jan Yün-hua*, Mosaic, Oakville, Ontario, 1991, pp. 277-300

許理和, 1991, 《最早的漢語佛教經典新見》，收於篠原亨一與紹本（編輯），《從瓦拉納西到北京：冉雲華教授佛教與中國宗教紀念集》，奧克維爾，安大略：摩塞克，頁277-300。